

中国社会转型视域下的“民生”价值意蕴

魏红征

(东莞理工学院 政法学院,广东 东莞 523808)

摘要:为探析中国社会转型期改善民生的基本内涵、价值理念及价值路径,在对“民生”内涵溯源与梳理的基础上,采用规范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对转型期改善民生的价值路径展开分析。分析认为:当代中国“民生”不仅具有“民生在勤”和“国计民生”的内涵,还应包含“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和“主权在民”的价值理念;改善民生的价值路径应以追求社会财富分配公平合理为出发点,实施“民富国强”的治国理念,建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防范陷入“国富民穷”、贫富差距悬殊等社会转型陷阱。

关键词:社会转型;民生;收入分配;价值路径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3)01-0084-06

当前中国已处于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矛盾凸显期,改善“民生”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这对于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维护社会秩序与稳定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就指出“社会管理要搞好,必须加快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1]。当前各级政府也将改善“民生”作为工作重点,然而实践中有关民生的内涵、改善“民生”的出发点和基本理念与路径、应重点防范的问题还存在认识上的模糊不清,甚至本末倒置的问题。因此,笔者拟通过对“民生”的内涵进行回溯性梳理及其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应有之义的分析。

一、“民生”内涵的溯源

(一)“民生”的滥觞

“民生”最早载于《左传·宣公十二年》:“民生

在勤,勤则不匮。”在这里,“民”指百姓,“生”指生活,即百姓的生活在于勤劳,勤劳就不会生活资料匮乏。就此而言,在社会个体层面,“民生”可以理解为民众维持基本生存和生活的所需条件。改善“民生”主要在于民众依靠自身的辛勤劳作,创造出更多的生活资料,进一步维持自己在社会中的生存与发展,达到“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道德经·第八十章》)的理想状态。然而,这样的“民生在勤”思想也仅适用于理想条件下小国寡民的自然经济,故从社会个体层面而言,改善“民生”离不开民众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创造更多的财富,即解决“民生”问题首先必须把蛋糕做大。但诡谲之处在于,中国历朝历代的百姓并不缺乏辛勤劳作,但多数时期依然无法改善自身的生存状况。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在紧抓“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指引下,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国民众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生活的诸多方面已得到了较大改善,但一些

收稿日期:2012-10-12

基金项目:西安市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项目(12S26);东莞理工学院创新人才计划项目(J201134)

作者简介:魏红征(1978-),男,陕西西安人,讲师,管理学硕士。

“民生”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2]。由此可见,虽然“民生在勤”思想指出了改善“民生”必须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但是未揭示改善“民生”与政治经济体制、社会价值理念等诸多宏观环境因素的联系,这正是其弊端所在。

(二) 儒家的“国计民生”思想

儒家从维护君王统治的“仁政”角度提出“国计民生”的思想,即“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君以民存,亦以民亡”(《礼记·缙衣》),“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这种“国计民生”的“民本”思想成为与“君本”相对应的中国封建政治官方文化中的一种重要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封建统治者意识到需要通过减轻赋税徭役、明德慎罚、崇俭去奢的方式来维持统治的稳定与长久。因此,汉代“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或清代“康乾盛世”都采取休养生息、藏富于民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促进了社会稳定,改善了民众的生存状况,从而形成了盛世局面。但“国计民生”思想并不是限制权力的“牢笼”,无法抑制统治者因骄奢淫逸、暴虐无道或横征暴敛而戕害民生,而改朝换代又大都发端于这种民不聊生的状况^[3]。“国计民生”思想阐明了“民生”问题对于国家政权兴亡和社会安定的重要性,并且在此思想指导下形成了一些有利于“民生”改善的安邦治国之策。但这种名为“以民为本”,实为“以君为本”和“官本位”的“民生”思想始终是为统治者服务的,其维系和改善“民生”的机理、动机及方式无法适用现代中国社会^[4]。

(三)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

近代以来有关“民生”思想的表述,当以孙中山在其“三民主义”中所提出的“民生主义”为代表。“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5],即要有使人民生存的基本保障,要有使人民生活改善的发展机会,要有使人民生命得到尊重的社会氛围。孙中山认为,要实现“民生主义”可以通过“涨价归公”的方式“平均地权”,以节制私人资本和发展国家资本的方式发展实业,并且主张“民生”问题必须与民族、民权同时解决。孙中山基于“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及人文关怀的精神,也揭示了

“民生”改善与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等诸多方面的关联——民族独立和“主权在民”是基本的前提,发展经济是必需的基础,同时辅以公平、合理的社会分配制度,才能保证人民基本生活福利的持续改善。然而“民生主义”无论从学理角度还是实践而言都存在问题。孙中山的“涨价归公”理念源于1879年美国经济学 John 所出版的《进步与贫困》,但其“涨价归公”理论在学理上存在明显的不合理性。特别是在近现代社会工商业文明下,土地已不是决定社会财富分配多寡的支配性因素,社会财富分配由权力、资本、知识、技能和机制等多种要素共同决定。同时,国家资本垄断的公共事业,如铁路、电信、水利和电力,不会必然带来费用的降低、效率及服务品质的提高,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在理论上也对此提出了诸多驳斥^[6]。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进程也证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在中国具体实践中行不通,但其所倡导的“以人为本”和“主权在民”的“民生”思想对于中国当前社会“民生”改善仍具有重大意义。

二、转型期改善“民生”的价值路径分析

(一) “民富国强”的治国理念

1. “民富国强”的溯源

社会财富在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分配比例对于“民生”的影响非常大,必须正确对待“民富国强”与“国强民富”的关系。“民富国强”一词出自汉代赵晔的《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越王内实府库,垦其田畴,民富国强,众安道泰。”社会财富如何在国与民之间分配,中国古代先贤也早有论断,管仲曾言:“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子·治国》)。孔子认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荀子则曰:“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上下俱富”,“国计之极也”(《荀子·富国》)。朱熹的《论语集注》也主张:“民富,则君不至独贫;民贫,则君不能贫。”美籍华裔经济学家黄仁宇考证,正是由于康乾时期清朝个人税赋比英国个人税赋的实际低很多才成就了康乾盛世^[7]。这些说明中国历史上本来就有轻徭薄赋、休养生息、藏富于民的优良传统思想,不仅体现为儒家“政在使民富”

(《说苑政理》)的思想以及“民富国强”的儒家财政思想,并且是诸多明君、贤臣和智者的治国共识。管仲还指出:“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论语·子路》亦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由此可见,管仲和孔子还认为只有“民富”在先,而后才可能使民众素质提升,达到社会文明进步的目的,所谓“民富”而“国强”。

2. “国强民富”的利弊

当然中外历史也不乏“国强民富”的先例,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为称雄争霸纷纷寻求富国强兵之策,先秦法家代表商鞅主张奖励耕战,甚至提出“国强民弱”思想,即置民众于贫穷饥寒之中,以期达到利用奖罚使民众从令如流,以赴耕战,使国富与民富、国强与民强完全对立了起来^[8]。但是商鞅变法在客观上还是促使了秦国民众生活富足、国家强盛(《史记·商君列传》)为秦统一中国奠定了基地。但这也促使自秦统一中国以后的许多统治者实行外儒内法,名为儒家的“轻徭薄赋”之言,实为法家的“富国弱民”之策,导致民生凋敝,成为引发改朝换代的导火索。特别是秦朝与隋朝虽然修建了万里长城和大运河,对促进国家军事防御、社会安宁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是终因过度劳民伤财、民怨沸腾导致国家政权崩溃。

近代以来,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导致国弱民穷并屡遭外辱,加之受日本明治维新思想的影响,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亦或新中国成立以来皆以强国为先,使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民富国强”本末倒置为“国强民富”并被不断强化。但长期强调“国强民富”非常有害,如前苏联为与美国争霸展开军事竞赛,使国家财力过多地用于国防开支,加之未能对经济和政治体制适时改革,致使体制僵化低效、腐败严重泛滥和社会发展停滞。长期优先发展军工产业和重工业,使农业、轻工业、食品工业和贸易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受到忽视,最终导致日常生活物资和商品极度匮乏,进而引发“民生灾难”成为前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9]。另外,一些欧洲国家的“国强民富”形式同样存在问题,通过“高税收”、“高福利”构建出的“福利性国家”,市场作用被国家干预或取代而弱化,导致资源配置低效、个人和国家竞争力减弱,同样引发严重社会危机和民生问题,当前南欧诸

国所发生的债务危机就是新证^[10]。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代表性人物哈耶克还认为,如果民众生活过于依赖国家,最终还会使国家走向“极权主义统治”,人民走向被“奴役”之路。

3. 从“国强民富”迈向“民富国强”

现代社会由于国家所承担的公共事务越来越多,公共支出的持续增长必然导致财富在分配时应提高国家所占比例,但这个比例并非越高越好。新中国建立之时由于国家贫弱、百废待兴,国际环境又复杂险恶,急需国家先强大起来,才能为“民富”提供保障,故长期提倡“国强民富”,通过早期计划经济使中国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必要的国防力量。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随着市场经济逐步完善,中国GDP已跃居世界第二,国家综合实力日渐增强,可谓已经达到“国强民富”的意境。然而,“国强”的根本目的是“民富”,“民富”又是“国强”的重要标志,并且“民富”可以促使国家保持持久稳定和更加强盛^[11]。

第一,“国强”与“民富”并不同步。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全国GDP从1978年的3 645.2亿元,达到2008年的300 670亿元,增加了81.5倍,按可比口径计算,增加了15.4倍,每年平均增长9.76%。但2008年全国居民人均收入9 700.3元,为1978年166.3元的58.33倍,可比口径计算,增加了11.75倍,年均增长为7.93%^[12]。近5年来,中国GDP年均增长10.6%,而名义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1.09%,实际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6.69%^[13]。2011年全年GDP为471 564亿元,全国财政收入103 740亿元,财政收入突破10万亿,2011年全国130个城市卖地收入超1.8万亿,仅据此匡算政府所占份额为25.8%。相比之下,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明显高于GDP的增长速度,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则明显落后于财政收入,也落后于GDP的增长速度。目前学界比较认可的是,近年来新增国民财富约1/3为政府收入,1/3为企业利润及非劳动性收入,仅有1/3属于普通劳动者收入,故虽然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在210个国家和地区排100名左右,名义上已处于中上等收入水平,但是实际上多数普通民众收入还处于低收入水平,甚至由于有些“民生”问题长期得不到改善而贫穷。由此可见,30多年来中国“国富”与“民富”并不同步,一方面是国家财政收入日益增加,另一方面是多数民众因教育、医疗、住房及物价等方面

负担日益加重,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可支配收入并未大幅增加,也缺乏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形成“民生”艰涩的“国富民穷”状况。

第二,“民富国强”更利于改善“民生”。显然“国富民穷”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国富民穷”只会导致国家与民众两者产生离心力,无法形成共生的利益共同体,民众会对经济发展漠然,对社会风气衰败麻木,最终使国家发展失去活力而僵化。国家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旨在提供公共产品,从而改善“民生”,“使民众免于匮乏”^[14]。从狭义上来讲,国家要为民众提供基本生存条件和物资;但从广义上来讲,国家应使民众自身富裕,从而免于匮乏,而不是政府不断救济,而民众依旧贫穷。国家的强大应以民众的富裕为基础,合理控制财富在民众和国家之间的分配比例是衡量“民生”、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主要包括普通民众税负率、通货膨胀率和社会保障完善程度以及国家从民众手中间接获取的财富多寡,如土地买卖、公共服务和能源供给等方面的收益。简而言之,当前对待“民富”与“国强”关系应遵循“民富国强”,而非“国富民强”,亦非“国强民富”。正所谓“小河有水大河满,小河无水大河涸”是自然规律,“民富国强”符合现代经济学规律,更利于改善“民生”,这是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成功所必需的。

(二) 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

1. 基尼系数超“警戒线”,收入差距悬殊

在改善“民生”方面,除应注意社会财富在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分配比例,还应注意社会财富在民众内部的分配比例,即收入差距过大或过小问题也是影响“民生”的重要因素。基尼系数是国际上定量测定居民收入差距的普遍认可指标。基尼系数保持在 0.2~0.4 之间较为理想,目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居民收入差距普遍居于这个区间。根据联合国相关组织对基尼系数的划分,基尼系数低于 0.2,表示居民收入差距过于公平,会导致个体及整个社会发展动力不足;高于 0.4,表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警戒线”,会引发一些社会问题及社会不安定。根据李实与国家统计局合作开展的中国基尼指数的大型调查和测算,2007 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 0.48^[15]。当然有学者指出,由于中国是个二元经济的国家,城市和农村的生活成本与收入结构存在较大差别,不应以总体基尼系数反映,应按照

城镇、农村分别计算基尼系数,应远低于总体基尼系数。但依据李实的课题组测算,1995 年的农村基尼系数为 0.34^[16],而 2011 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农村基尼系数为 0.39,加上一些农村高收入者的隐性收入,说明农村收入差距还在不断扩大,并且已经非常接近或者超过“警戒线”。

同时,这样计算也抹杀了城乡收入差别的客观事实。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1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1 810 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 6 977 元,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 3.13。另外,虽然当前中国客观存在城乡差别,但是由于近年来入城打工农民日益增多,甚至某些农民长期在城市生活,城乡之间早已不是相对封闭、互不干扰的单纯二元社会结构,城乡之间在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方面日趋融合。2011 年城镇人口数量也首次超过农村,城镇人口为 69 079 万人,乡村人口为 65 656 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 51.27%,故目前强调分别计算城乡基尼系数已无太大意义。

目前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已超过 3,国际上一般城乡居民收入比在 2 以下;行业之间职工工资差距明显,最高的与最低的相差 15 倍左右;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拉大,如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 18 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 128 倍^[17]。世界银行报告显示,中国的财富集中度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18]。

2. 收入差距悬殊本质在于不公平、不合理的收入分配体制

目前造成居民收入差距悬殊的根本原因还是各级政府对改善“民生”的举措重视不足,客观上导致不同利益主体的收入增长严重不平衡,这本质在维护一种不公平、不合理的收入分配体制。孔子曾言:“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孔子并不是强调不患“寡”和“贫”,否则与其“仁政”和“富民”也相违背,其所患“不均”并非指不平均,而指不遵名分、不按规矩分配社会财富,强取豪夺践踏了社会公认的“公平”、“合理”的标准,进而“不均”导致人们“不安”于现存秩序而造次,故孔子本意应为“不患寡而患不公”。换言之,人们对分配方式是否合乎“正义”比对分配的结果即财富占有的多寡更加关注,古今中外概莫如此^[19]。

当前中国收入分配体制不公平、不合理主要表现为:(1)有些地方政府凭借控制大量公共资源,如土地矿山、公共投资、公共基金、公用设施等,可以大幅增加预算内外财政收入。但由于缺乏透明有效的监督机制,使政府工作人员借此增加隐性收入和福利,或制定出有利于自己的财富分配方案,并且政府职能部门的个别领导收益通常更加显著,类似情况在一些企事业单位也存在。(2)国有垄断行业凭借垄断优势而非企业竞争力获取暴利,如金融、保险、电力、电信、烟草等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的2~3倍,其职工不足全国职工总数的8%,收入却占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18]。(3)对通过不合理甚至违法手段获得高收益者惩戒不足,如利用国有企业或上市公司高管身份获取天价报酬者、利用囤积土地、侵占国有资产、内幕交易信息等获取暴利者与直接通过贪污腐败、权钱交易、利益输送方式积累巨额资产的官员及甚至利用走私、欺行霸市、强迫劳动等违法犯罪活动获得高收入者。(4)对于社会其他高收入群体的收入调整力度不足,这些群体包括依靠知识技术与特殊才艺获取高额报酬者、依靠所开办企业获得合法经营性收入者及凭借投资于楼房、股票、期货等使资产大幅增值者等。

3. 收入差距悬殊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目前中国贫富差距如此悬殊,社会还能够较为安定,主要在于政府近年注重维稳工作,社会控制力度大,经济高速发展。但一旦经济增长失速或者陷入滞涨,就可能引发严重失业问题,加之社会缺乏完善的保障机制,收入差距悬殊就会使民众对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心理发酵,从而产生不公平感、挫败感,进而可能引发危害社会的行为,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因此,当前收入差距悬殊必须引起高度警惕,毕竟中国社会保障福利制度还不完善,并且低收入者人群众多,收入差距悬殊会引发一系列社会“民生”问题,如社会价值观扭曲、仇富仇官心理加重、社会阶层日益对立、报复社会行为出现、危害社会治安与刑事违法犯罪加剧、群体性事件增多及造成社会动荡等严重后果。

由于国家的财政收入最终还是用于公共支出或公共投资,并且存在赤字和债务,而大多数中低收入者仅能维持日常生活所需的基本开支,故收入差距悬殊的分配方式只能导致国家与民众双输,结果是“国穷民贫”,引发社会动荡不安,甚至不堪的“民

生”危机,只有少数富裕阶层可以通过移民等方式规避这种风险。甚至少数贪腐的权贵阶层还会借机颠覆现有社会主义人民政权和体制,达到攫取更大利益或权力,伺机分割国家财产,将非法收入合法化的目的^[20]。同时,目前中国社会收入分配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也会竭力阻挠法律监管或税收手段对其收入的调整,特别是一些依靠资源垄断、暗箱操作、囤积土地、欺诈上市、内部交易等手段获得暴利者会严重阻碍各项改善“民生”举措的落实。

从基尼系数来看,长期陷于“中等收入陷阱”典型的阿根廷和马来西亚的基尼系数都较高,相对而言,成功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转换的日本和韩国的基尼系数始终控制在0.4的“警戒线”以内。日本和韩国成功的主要原因就是合理解决了收入分配的公平性问题。如果基尼系数持续走高,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致使普通民众消费能力偏弱,经济结构难以调整,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21]。

4. 建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

当前中国缩小收入差距的根本解决之道还是构建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大力实施改善民生举措:必须要调整收入分配体制,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也要完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构建具有广泛包容性的和谐社会。其主要措施包括:第一,加大对腐败惩治力度,因为腐败既是导致目前一些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直接原因,也是未来改革分配收入制度最大的“拦路虎”;第二,不断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建立劳动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第三,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等转移性支付制度,完善税收在调节收入二次分配的功能;第四,收入分配制度不仅要体现利益公平,还包括机会的公平,并且政治体制改革应有实质性的进展,使公共权力切实得到约束,防止其异化或寻租。总之,收入分配制度中有违社会公平、公正价值的部分都对改善“民生”造成危害,故必须对这些危害“民生”的问题加以重视,使收入分配制度真正彰显公平正义,才能促进“民生”的切实改善和社会稳定和谐^[22]。

三、结 语

综上所述,从社会个体的微观层面而言,“民

生”就是民众维持生存和生活所需的基本条件。所谓基本条件是指在日常生活中包括政治权利、文化教育、生活方式和社会心理等各方面能够达到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明发展水平相匹配的合理水平,如中国现代社会中公众子女平等入学、社会医疗、养老保障以及拥有安稳居所等都属于“民生”的基本范畴。具体而言,“民生”应涉及衣食住行、物价收入、教育医疗、救济保障、治安维护、休闲娱乐、环境保护等诸多方面内容。社会个体只要遵循勤劳致富、诚实信用和遵纪守法的信念,就能够通过自身努力改善自己的生存境况和生活条件。从社会管理的宏观层面而言,“民生”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多宏观环境因素相联系,“民生”就是国家要为民众提供生存的基本保障、生活改善的发展机会以及生命得到尊重的社会氛围,即大力发展经济,构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为社会个体“民生”改善创造条件,打击戕害“民生”的违法行为,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民生”改善是涉及国家政权兴衰、安定和睦以及社会文明发展进步的重大事项,必须从“以人文本”和“以民为本”基本理念出发,构建体现“主权在民”思想和人文关怀精神的制度体系。改善“民生”从本质上而言,主要为了追求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合理,故应遵循“民富国强”的基本路径,特别要防范“国富民穷”、收入差距悬殊等社会发展转型的陷阱。总之,当前只有“民生”改善需求得到很好满足,使经济发展具有可持续性,社会更加和谐稳定,国家日益强盛,民众可以追求更高层次的幸福生活,才标志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功转型。

参考文献:

- [1] 胡锦涛. 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体系[N]. 人民日报,2011-02-20(1).
- [2] 侯 华. 解决民生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關鍵[J]. 理论前沿,2007(18):41-42.
- [3] 杨京宁. 中国“吏治”的困境及其应对之道:试从公共权力的异化及对其有效制约角度分析[J]. 陕西行政学院学报,2010,24(3):60-64.
- [4] 王玉灵,霍有光. 民主民本民生理念辨析及理论构建[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1(6):6-9.

- [5] 孙中山. 孙中山选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6] John T H. Neoliberalism, Neoclassicism and economic welfare[J].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2010,44(2):359-368.
- [7] 黄仁宇. 中国大历史[M]. 北京:三联书店,2008.
- [8] 李林林. 论商鞅的强国弱民思想[J]. 现代商贸工业,2011(24):64-65.
- [9] 郭欣根. 苏联解体原因的几种主要观点述评[J]. 社会主义研究,2003(2):11-15.
- [10] Cottarelli C. Sovereign debt crisis:why in Europe and not elsewhere? [J]. Intereconomics,2012,47(2):74-75.
- [11] 陈柳钦. 中国:从“国强民富”到“民富国强”的新历程[EB/OL]. (2011-06-08)[2011-07-10]. http://www.qstheory.cn/jj/jjggyfz/201106/t20110608_85372.htm.
- [12] 谢文斗. 国家发展迅速居民收入偏低:简析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状况[EB/OL]. (2010-09-28)[2011-10-10]. <http://www.unicornblog.cn/user1/unicornblog/25964.html>.
- [13] 闫 坤. 对我国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深层原因分析[N]. 经济参考报,2008-04-25(4).
- [14] Benedek W. Human security and human rights interaction[J].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2008(59):7-17.
- [15] 李 实. 中国收入分配中的几个主要问题[J]. 探索与争鸣,2011(4):8-12.
- [16] 李 实. 对基尼系数估算与分解的进一步说明:对陈宗胜教授评论的再答复[J]. 经济研究,2002(5):84-87.
- [17] 新华社调研小分队. 我国贫富差距正逼近容忍“红线”[J]. 理论参考,2010(7):37-38.
- [18] 丛亚平,李长久. 收入分配四大失衡带来经济社会风险[N]. 经济参考报,2010-05-21(8).
- [19] 鄢烈山. “不患寡而患不均”正义[N]. 江南时报,2004-11-02(3).
- [20] 杨 帆. 权力资本化:腐败的根源[J]. 决策与信息,2001(5):27-28.
- [21]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22] 李 实. 和谐社会与社会公平[C]//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前沿 创新发展:学术前沿论坛十周年纪念文集(2001 ~ 2010).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29-135.

(下转第96页)

- 72-80.
- [9] 郭秀晶. 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的现状分析及发展路径选择[J]. 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11(5): 234-238.
- [10] 罗公利, 杨选良, 李怀祖, 等. 社会捐赠与大学发展: 中美大学社会捐赠的对比分析[J]. 高等教育研究, 2006, 27(1): 99-104.
- [11] 张 云. 美国加州大学系统捐赠基金运作实践及启示[J]. 比较教育研究, 2004(6): 46-51.
- [12] 胡 娟, 张 伟. 哈佛大学资金来源、筹资模式及启示[J]. 高等教育研究, 2008(5): 104-109.
- [13] 邢相勤, 丁苗苗, 刘 锐. 中美高校教育基金会运行机制比较及思考[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11(5): 109-113.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fund from perspective of civil society

Ji Qiang

(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Hunan,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ivil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trend and context of current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foundations were analyzed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vil society, universities and university education fund. The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foreign advanced experience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foundations should be absorbed and referred; the management model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foundation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hould be established using a variety of ways; the financial and taxation system as levers for comprehensive support construction should be established and the market operation mechanism of non-public offering foundations should be considered.

Key words: China; citizen society; high education system; university education foundation

(上接第 89 页)

Value implication of the people's livelihood from perspective of social transition in China

WEI Hong-zheng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Dongg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ongguan 523808,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basic connotation, value ideas and value path of improving the people's livelihood during social transition in China, based on tracing to the source of the people's livelihood connotation and combing its development, the article adopted norms and empirical combination method to analyze the value path of improving people's livelihood. According to analysis, "the people's livelihood" not only has "the people's livelihood lies in diligence" and "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people's livelihood" connotation, but also has the "regarding the people as the foundation", "people oriented" and "popular sovereignty" value ideas. The value path of improving the people's livelihood should make the pursuit of social fair and reasonable wealth distribution as the starting point, following the administrative philosophy of "the people rich then the country strong", and guarding against falling into the social transition traps such as "the country strong but the people poor", polarization of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and so on.

Key words: social transition; people's livelihood; income distribution; value path